

# “伊斯兰国”在撒哈拉以南 非洲地区的渗透及其影响因素 分析\*

刘中民 赵跃晨

**【内容摘要】** “伊斯兰国”在撒哈拉以南非洲地区迅速蔓延，既是其建立所谓“哈里发国家”战略图谋的一部分，同时也与其在伊拉克和叙利亚遭到重创后寻求新的生存空间有关。“伊斯兰国”在这一地区形成了较为完整、严密的渗透网络体系，并争夺“基地”组织的势力范围。其扩张的有利因素主要包括当地伊斯兰极端主义盛行，国家治理能力低下甚至缺失，社会矛盾激化等；不利因素主要包括本土极端组织对“伊斯兰国”的依赖相对有限，“基地”组织影响深厚，全球反恐合作制约了“伊斯兰国”的扩张。鉴于其渗透是该地区自身“顽疾”的综合体现，相关国家在推动国际合作，共同应对“伊斯兰国”威胁的同时，应加强自身治理能力建设，从源头上压缩“伊斯兰国”的渗透空间。

**【关键词】** 撒哈拉以南非洲 “伊斯兰国” 极端主义

**【作者简介】** 刘中民，上海外国语大学中东研究所教授(上海 邮编: 200083); 赵跃晨，云南大学国际关系研究院硕士研究生(昆明 邮编: 650091)

**【中图分类号】** D815.1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6-1568-(2018)02-0112-22

**【DOI 编号】** 10.13851/j.cnki.gjzw.201802007

---

\* 本文系 2016 年度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全球伊斯兰极端主义研究”(16ZDA096)的阶段性成果。

2014年6月,随着巴格达迪(Abu Bakr al-Baghdadi)宣布“建国”,“伊斯兰国”(Islamic State of Iraq and Syria)迅速成为新型国际恐怖主义的代表。具有实体化、准国家化特点的“伊斯兰国”取代“基地”组织成为国际恐怖主义的核心,并成为大规模恐怖袭击的主要发起者,极端主义和恐怖主义意识形态的传播者,以及世界各地恐怖极端组织的效忠对象。<sup>①</sup>在意识形态层面,“伊斯兰国”坚决主张将建立所谓哈里发国家的目标付诸实践;特别强调什叶派和逊尼派的矛盾,煽动教派仇恨和教派冲突;强调滥用暴力的“进攻性圣战”并付诸实施。<sup>②</sup>在现实层面,“伊斯兰国”的扩张对中东地区和整个世界的和平与安全构成了严重威胁。其主要表现之一是“伊斯兰国”在全球范围内的扩散和渗透,并在西亚、非洲、中亚、南亚、东南亚出现了一批效忠“伊斯兰国”的极端组织。

2015年下半年以来,国际社会加大了对“伊斯兰国”的打击力度,使其失去大片控制区域,并陷入严重生存危机。2015年9月俄罗斯军事介入叙利亚,对“伊斯兰国”进行空袭,成为打击“伊斯兰国”斗争的重要转折点;2015年11月巴黎发生严重恐怖袭击,促成了美、欧、俄打击“伊斯兰国”新联盟的形成,美欧与俄罗斯协调打击行动,进而对“伊斯兰国”构成了实质性压力。在此背景下,“伊斯兰国”在负隅顽抗的同时,也开始在全世界寻找新的“据点”。随着“伊斯兰国”在叙利亚、伊拉克遭受“亡国”的灭顶之灾,其极端主义意识形态、组织和人员的外溢和扩散,将成为国际安全面临的最为严峻的威胁之一。

目前,国内学界对“伊斯兰国”的渗透和扩散已有初步的研究,研究的对象区域多集中于中亚、南亚、东南亚等地区,其中对非洲的研究多集中于北非地区,<sup>③</sup>而对撒哈拉以南非洲地区却缺少深入研究。但在事实上,向撒

---

<sup>①</sup> 刘中民:《国际反恐形势进入新历史阶段》,《文汇报》2015年11月15日,第5版。

<sup>②</sup> 参见刘中民、俞海杰:《“伊斯兰国”的极端主义意识形态探析》,《西亚非洲》2016年第3期,第41页。

<sup>③</sup> 相关的代表性成果主要包括:董漫远:《“伊斯兰国”外线扩张:影响及前景》,《国际问题研究》2016年第5期,第88-102页;张金平:《从安全环境分析“伊斯兰国”在北非的扩张》,《山东警察学院学报》2015年第6期,第5-12页;刘中民、赵星华:《埃及西奈半岛极端组织浅析》,《国际研究参考》2015年第12期,第45-50页;郭强:《“伊斯兰国”在利比亚的扩张初探》,《国际研究参考》2016年第7期,第35-41页;王晋:《“伊

哈拉以南非洲地区转移力量，寻找新的立足点，也是“伊斯兰国”的重要策略之一。2016 年底，巴格达迪曾宣称“伊斯兰国”已经将其部分成员、媒体和资金转移至非洲地区。<sup>①</sup>撒哈拉以南非洲地区自身的安全脆弱性和治理缺失，也为“伊斯兰国”进行扩张创造了条件。本文试图探讨“伊斯兰国”在撒哈拉以南非洲地区的渗透，分析“伊斯兰国”在非洲大陆渗透的发展脉络、影响及其制约因素等问题。这对于全面理解“后伊斯兰国”时代的全球恐怖活动态势和国际反恐形势有着重要的现实意义。

## 一、“伊斯兰国”在撒哈拉以南非洲地区的渗透及其影响

“伊斯兰国”在撒哈拉以南非洲地区迅速蔓延，首先是其建立所谓“哈里发国家”图谋的一部分，同时也与其在伊拉克和叙利亚遭到重创后寻求新的生存空间的策略有关。

自宣布“建国”以来，“伊斯兰国”一直将“生存”和“扩张”视为其自身发展的两大方向，这表明“伊斯兰国”的雄心不仅仅局限于叙利亚和伊拉克等地，而是希望寻求突破现有边界限制，“团结”更广阔地域内的穆斯林群体，最终实现建立“哈里发帝国”的野心。<sup>②</sup>正如“伊斯兰国”发言人阿布·穆罕默德·阿德纳尼（Abu Mohamed al-Adnani）所言，随着“哈里发帝国”权力的扩张，全球所有酋长国、族群、国家的合法性都将不复存在。2014 年 6 月，“伊斯兰国”在攻占摩苏尔（Mosul）几周之后，便在其社交媒体上发布了一幅地图，以显示“伊斯兰国”未来五年的扩张计划。虽然这幅地图的来源并不确定，但“伊斯兰国”的成员和支持者纷纷在社交媒体上进行传播。在这幅地图中，中东、欧洲、亚洲和非洲都笼罩在“伊斯兰国”

---

伊斯兰国”组织在利比亚的扩张及其制约因素》，《阿拉伯世界研究》2016 年第 3 期，第 90-102 页；王金岩：《利比亚已成为“伊斯兰国”的“新中心”》，《当代世界》2016 年第 6 期，第 42-45 页。

<sup>①</sup> Joseph Siegle, “ISIS in Africa: Implications from Syria and Iraq,” Africa Center for Strategic Studies, March 17, 2017, <http://africacenter.org/spotlight/islamic-state-isis-africa-implications-syria-iraq-boko-haram-aqim-shabaab/>.

<sup>②</sup> Julien Barnes-Dacey, Ellie Geranmayeh, and Daniel Levy, *The Islamic State through the Regional Lines*, London: The European Council on Foreign Relations, 2015, p.19.

的旗帜之下。<sup>①</sup>此外，“伊斯兰国”的官方杂志《达比格》（*Dabiq*）还明确规划了隶属于“哈里发帝国”的非洲“行政区划”：由苏丹、乍得、埃及组成的阿尔基那纳省（*Alkinaana*），由厄立特里亚、埃塞俄比亚、索马里、肯尼亚和乌干达组成的哈巴沙省（*Habasha*），由利比亚、突尼斯、摩洛哥、阿尔及利亚、尼日利亚、尼日尔以及毛里塔尼亚组成的马格里布省（*Maghreb*）。<sup>②</sup>由此不难看出，“伊斯兰国”已将西非、北非、中非、东非等地区视为“哈里发帝国”版图的一部分。

“伊斯兰国”向撒哈拉以南非洲地区进行渗透也是其在生存危机不断加剧背景下进行策略调整的产物。随着国际社会不断加大对中东地区“伊斯兰国”势力的打击力度，“伊斯兰国”被迫调整生存战略，开始向包括撒哈拉以南非洲地区在内的其他区域转移力量。2014年9月，美国总统奥巴马（*Barack Obama*）呼吁各国加入以美国为首的抗击“伊斯兰国”联盟，并开始对“伊斯兰国”进行空袭。2015年9月，俄罗斯在叙利亚空军的配合下，首次对“伊斯兰国”实施空中打击。<sup>③</sup>在2016年，“伊斯兰国”的领土控制能力、资金来源、人员招募、核心领导层等都遭到重创。在伊拉克，政府军先后收复提克里特（*Tikrit*）、辛贾尔（*Sinjar*）、费卢杰（*Fallujah*）、拉马迪（*Ramadi*）等重要城市；在叙利亚，“伊斯兰国”接连丢失从拉卡（*Raqqah*）到代尔祖尔（*DairAlzour*）之间的大片土地。进入2017年之后，国际社会对“伊斯兰国”的打击取得重大进展。随着“伊斯兰国”在伊拉克的大本营摩苏尔于2017年7月被收复，“伊斯兰国”在叙利亚的大本营拉卡也已于2017年10月获得解放。截至2017年9月初，“伊斯兰国”在叙利亚控制的区域只占全国面积的不足15%，在伊拉克也丧失了90%的控制区。<sup>④</sup>在这种背景下，面临军事挫败、“领土”丧失和财政压力等挑战的“伊斯兰国”被迫调整战略，开始在全世界范围内寻找新的“据点”，撒哈拉以南非洲地区也因

---

<sup>①</sup> Simon Allison, *The Islamic State: Why Africa Should be Worried*, Pretoria: Institute for Security Studies, 2014, p. 3.

<sup>②</sup> Joseph Siegle, “ISIS in Africa: Implications from Syria and Iraq,” <http://africacenter.org/spotlight/islamic-state-isis-africa-implications-syria-iraq-boko-haram-aqim-shabaab/>.

<sup>③</sup> 卢光盛、周洪旭：《“伊斯兰国”对东南亚的渗透：态势、影响及应对》，《南洋问题研究》2017年第3期，第53页。

<sup>④</sup> 韩晓明：《叙政府军解围代尔祖尔》，《人民日报》2017年9月9日，第11版。

此成为其渗透扩张的重要对象之一。

(一) “伊斯兰国”在撒哈拉以南非洲地区渗透的主要方式

“伊斯兰国”在非洲的渗透方式主要包括人员“回流”、媒体宣传和资金收买等方式，形成了较为完整、严密的渗透网络体系，并初显成效。

人员“回流”是“伊斯兰国”在撒哈拉以南非洲地区渗透的主要方式。对于撒哈拉以南非洲地区极端分子加入“伊斯兰国”的具体人数，各方有不同的估算。根据苏凡集团(The Soufan Group)2017年10月的报告，在叙利亚和伊拉克地区参与“圣战”的成员中，约有150名苏丹人。<sup>①</sup>此外，撒哈拉以南非洲的其他国家也有人员前往叙利亚和伊拉克参与“圣战”的情况。这些在叙利亚和伊拉克接受过专业训练和具有丰富实战经验的人员“回流”非洲后，迅速成为“伊斯兰国”在非洲地区的宣传机器和战斗人员。美国非洲司令部(United States Africa Command)司令罗德里格斯(David Rodriguez)表示，仅2015年，在非洲效忠“伊斯兰国”的人数就多达6000人，这些“圣战”分子不仅活动于北非地区，甚至在撒哈拉以南非洲地区也开始大量涌现，如索马里、尼日利亚、中非共和国和刚果等地区。<sup>②</sup>另外，有60—100名南非人加入了“伊斯兰国”，并且有一半已经返回南非。<sup>③</sup>在利比亚的“圣战者”中，大多数来自撒哈拉以南非洲地区，其影响因素包括谋求生存、意识形态或个人动机的驱使。<sup>④</sup>针对非洲南部地区穆斯林社区较为分散且大多数位于边缘地区的特点，“伊斯兰国”试图通过个人渗透和小组行动两种方式进行扩张。

“伊斯兰国”在撒哈拉以南非洲地区的迅速渗透，得益于其熟练运用新媒体技术的强大意识形态传播能力。一方面，“伊斯兰国”频繁使用脸书

---

<sup>①</sup> The SoufanCenter, *Beyond the Caliphate: Foreign Fighters and the Threat of Returnees*, New York: The Soufan Group, 2017, pp. 12-13.

<sup>②</sup> Senate Committee on Armed Services, *Counter- ISIL (Islamic State of Iraq and The Levant) Operations and Middle East Strategy*, Washington, D.C.: U. S. Government Publishing Office, 2016, pp. 19-20.

<sup>③</sup> Albertus Schoeman and Raeesah Cassim Cachalia, “Are ISIS Returnees a Risk for South Africa?” Institute for Security Studies, May 23, 2017, <https://issafrica.org/iss-today/are-isis-returnees-a-risk-for-south-africa>.

<sup>④</sup> Colin Freeman, “ISIL Recruiting Migrant ‘Army of the Poor’ with \$1,000 Sign-up Bonuses,” *The Telegraph*, February 1, 2016, <http://www.telegraph.co.uk/news/worldnews/islamic-state/12134806/Isil-recruiting-migrant-army-of-the-poor-with-1000-sign-up-bonuses.html>.

(Facebook)、推特(Twitter)等国际社交媒体向撒哈拉以南非洲地区的极端组织宣传其意识形态。例如,“伊斯兰国”于2015年发起了一场广泛的社交媒体运动,极力说服索马里“青年党”(al-Shabaab)脱离“基地”组织(al-Qaeda),这一做法成功促成部分“青年党”成员效忠“伊斯兰国”,建立了所谓的“伊斯兰国”索马里军区(Wilayat Somalia)。<sup>①</sup>另一方面,为适应本土化发展的需求,“伊斯兰国”开始在非洲本土设立宣传媒体,使其充当联系撒哈拉以南非洲地区极端组织的纽带。例如,“伊斯兰国”设立了一个名为“非洲媒体”(Africa Media)的社交媒体,成为其在北非、西非和萨赫勒等地区进行意识形态灌输的重要阵地。“非洲媒体”作为一个具有泛非色彩的媒体,自2014年9月出现以来不断在其推特上传播“伊斯兰国”的意识形态。<sup>②</sup>除承担宣传和招募工作外,“非洲媒体”还致力于为撒哈拉以南非洲地区的极端组织与“伊斯兰国”建立联系渠道。2015年5月,“非洲媒体”发表的声明显示,它不仅负责为“伊斯兰国”与突尼斯的“圣战”分子建立联系,而且在促成“博科圣地”(Boko Haram)和“穆拉比通组织”(al-Murabitun)向“伊斯兰国”效忠的过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sup>③</sup>

此外,为换取撒哈拉以南非洲地区极端组织的支持和效忠,“伊斯兰国”还积极为这些组织提供资金支持。“伊斯兰国”通过走私石油、文物贩卖等手段,获得超过了20亿美元的总资产。<sup>④</sup>作为曾经全球最富有的恐怖组织,“伊斯兰国”通过提供资金支持,在撒哈拉以南非洲地区笼络了一些原本效忠“基地”组织的本土极端组织。例如,在2014年年中,几名“伊斯兰国”成员前往索马里活动,并为“青年党”当时的领袖艾哈迈德·阿卜迪·古丹(Ahmed Abdi Godane)提供了数百万美元的资金,试图以此收买“青年党”向“伊斯兰国”效忠。<sup>⑤</sup>

---

<sup>①</sup> Jason Warner, “Sub-Saharan Africa’s Tree ‘New’ Islamic State Affiliates”, *CTC Sentinel*, p. 30.

<sup>②</sup> Daveed Gartenstein-Ross, Nathaniel Barr, and Bridget Moreng, *The Islamic State’s Global Propaganda Strategy*, Hague: The International Centre for Counter-Terrorism, 2016, p.64.

<sup>③</sup> *Ibid.*, p. 66.

<sup>④</sup> Martin Chulov, “How an Arrest in Iraq Revealed Isis’s \$2bn Jihadist Network,” *The Guardian*, June 15, 2014, <https://www.theguardian.com/world/2014/jun/15/iraq-isis-arrest-jihadists-wealth-power>.

<sup>⑤</sup> Daveed Gartenstein-Ross, Nathaniel Barr, and Bridget Moreng, *The Islamic State’s Global*

## （二）“伊斯兰国”在撒哈拉以南非洲地区的影响

这种影响主要体现在形成渗透核心区，“伊斯兰国”向“基地”组织的分支机构渗透，并催生新的极端组织，影响当地极端组织的活动方式等方面。

第一，“伊斯兰国”向撒哈拉以南非洲地区渗透的核心区已经形成。

自 2011 年利比亚战争爆发以来，教俗对抗、部落冲突和极端势力猖獗使利比亚一直处于无序的混乱状态，其政治真空也恰恰为“伊斯兰国”把利比亚打造成向非洲扩张和渗透的前沿阵地提供了条件。随着“伊斯兰国”在利比亚的发展壮大，该国已经发展成为“伊斯兰国”在叙利亚和伊拉克以外最具影响力的分支机构。

据美国情报部门的信息，伴随“伊斯兰国”在叙利亚和伊拉克的式微，许多外国“圣战”分子放弃前往叙利亚和伊拉克参与“圣战”的选择，转而选择前往利比亚加入“伊斯兰国”并发动“圣战”，足以说明利比亚有可能逐渐沦为“伊斯兰国”的又一大本营。<sup>①</sup> 有分析指出，由于地理位置的重要性，利比亚很可能成为联系“伊斯兰国”和撒哈拉以南非洲地区的枢纽；尽管人们尚未充分意识到利比亚重要的战略地位，但它已经成为“伊斯兰国”挺进埃及、苏丹、乍得、尼日尔、阿尔及利亚和突尼斯的战略通道。<sup>②</sup> 另有资料显示，“伊斯兰国”曾通过其所谓的利比亚的黎波里军区（Wilayat Tarabulus）媒体发布视频，宣示“伊斯兰国”以利比亚为中心向周边区域乃至撒哈拉以南非洲地区渗透和扩张的野心，该机构还于 2016 年 1 月中旬发布了一段旨在拉拢索马里武装分子的视频。<sup>③</sup> 从近期的形势看，“伊斯兰国”已经占据了利比亚这一关键枢纽，并且通过其漫长而脆弱的南部边境向撒哈拉以南非洲地区进行渗透。<sup>④</sup>

---

*Propaganda Strategy*, p.66.

<sup>①</sup> Daveed Gartenstein-Ross, Nathaniel Barr, and Bridget Moreng, *The Islamic State's Global Propaganda Strategy*, p. 69.

<sup>②</sup> Kamal Qsiyer, *The Islamic State (IS) in Libya: Expansion by Political Crisis*, Mecca: Al Jazeera Centre for Studies, 2015, p. 6.

<sup>③</sup> Daveed Gartenstein-Ross, Nathaniel Barr, and Bridget Moreng, *The Islamic State's Global Propaganda Strategy*, p. 69.

<sup>④</sup> Emily Estelle, "Ignoring History: America's Losing Strategy in Libya," *Critical Threats*, February 28, 2017, <https://www.criticalthreats.org/analysis/ignoring-history-americas-losing-strategy-in-libya>.

第二，“伊斯兰国”向“基地”组织的分支机构进行渗透，二者的争夺还催生了新的极端组织。

“伊斯兰国”自宣布脱离“基地”组织自立门户之后，其扩张和发展不可避免地“与基地”组织形成了竞争关系。为了强化对全球“圣战”的领导地位，“伊斯兰国”不断对“基地”组织分支机构进行利诱和拉拢。北非的“伊斯兰马格里布基地组织”（Al-Qaeda in the Islamic Maghreb）是“基地”组织的北非分支，而撒哈拉以南非洲地区的“博科圣地”和索马里“青年党”都与“基地”组织有密切联系，其中索马里“青年党”于2012年宣布向“基地”组织效忠。随着“伊斯兰国”的不断扩张，“博科圣地”和索马里“青年党”这两支与“基地”组织有密切联系的极端组织都成为“伊斯兰国”渗透的对象。<sup>①</sup>

在“伊斯兰国”意识形态的影响下，“基地”组织的分支机构的确出现了向“伊斯兰国”靠拢的迹象。2014年7月，“伊斯兰马格里布基地组织”高层领导人谢赫·阿卜杜拉·奥斯曼·阿齐米（Sheikh Abdullah Othman al-Assimi）发布了一段视频，表示希望与“伊斯兰国”建立友好关系。<sup>②</sup>同年7月，“博科圣地”领导人阿布巴卡尔·谢考（Abubakar Shekau）首次表态支持“伊斯兰国”领导人巴格达迪，并宣称将其在尼日利亚北部控制的城镇纳入“伊斯兰国”的领土。<sup>③</sup>2015年3月，“博科圣地”正式宣布效忠“伊斯兰国”，此举也意味着“伊斯兰国”的影响力扩展到了撒哈拉以南非洲地区。

“伊斯兰国”在撒哈拉以南非洲地区的渗透，激化了“基地”组织分支机构等极端组织的内部矛盾，导致一批“伊斯兰国”的同情者和支持者脱离原有的极端组织，另立山头。2016年9月至10月，在西非地区，一个名为“大撒哈拉伊斯兰国”（Islamic State in the Greater Sahara）的组织在尼日尔、

---

<sup>①</sup> 宁彘、王涛：《索马里青年党的意识形态与身份塑造》，《世界民族》2017年第3期，第41页。

<sup>②</sup> Hamid Yess, “Al-Qaeda in Islamic Maghreb Backs ISIS,” *Al-Monitor*, July 2, 2014, <http://www.al-monitor.com/pulse/security/2014/07/aqim-declaration-support-isis-syria-maghreb.html>.

<sup>③</sup> AFP, “Nigerian Town Seized by Boko Haram ‘Part of Islamic Caliphate’, Leader Says,” *The Telegraph*, August 24, 2014, <http://www.telegraph.co.uk/news/worldnews/africaandindianocean/nigeria/11054219/Nigerian-town-seized-by-Boko-Haram-part-of-Islamic-caliphate-leader-says.html>.



布基纳法索和马里边界地区连续制造了三起恐怖袭击。2016 年 10 月，在非洲之角地区，50 名“索马里伊斯兰国”（Islamic State in Somalia）组织成员占领了邦特兰（Puntland）的一个港口，使其成为“伊斯兰国”在索马里境内的第一块“领土”。<sup>①</sup>与此同时，一支名为“索马里、肯尼亚、坦桑尼亚和乌干达伊斯兰国”（Islamic State in Somalia, Kenya, Tanzania, and Uganda），亦称“东非贾巴”（Jahba East Africa）的组织正在整个东非地区崛起。上述三个极端组织均属于受“伊斯兰国”影响新成立的组织。

“大撒哈拉伊斯兰国”是“伊斯兰国”与“伊斯兰马格里布基地组织”既合作又竞争的矛盾关系的产物。由于“全球圣战”理念的差异，穆赫塔尔·贝尔莫克塔尔（Mokhtar Belmokhtar）于 2012 年脱离“伊斯兰马格里布基地组织”，单独领导“蒙面旅”（the Masked Men Brigade）。2013 年 8 月，“统一和圣战运动”（the Movement for Oneness and Jihad）、“蒙面旅”合并建立了“穆拉比通组织”，该组织一度取代“伊斯兰马格里布基地组织”在萨赫勒地区的影响力。随着“伊斯兰国”在中东地区不断壮大，“穆拉比通组织”中的几名关键领导人转而效忠“伊斯兰国”，但该组织领导人贝尔莫克塔尔却拒绝承认，并在“伊斯兰国”和“基地”组织的竞争中与“基地”组织保持一致。2015 年 5 月，“穆拉比通组织”高层领导人阿德南·阿布·瓦利德·萨哈威（Adnan Abu Walid Sahraoui）宣布向“伊斯兰国”效忠，导致该组织陷入分裂。<sup>②</sup>之后，萨哈威领导的成员逃至马里，建立了“马里伊斯兰国”，即“大撒哈拉伊斯兰国”的前身。尽管“伊斯兰国”接受了“大撒哈拉伊斯兰国”组织的效忠，但基于已经宣布“博科圣地”为“西非省”，为避免两个组织发生冲突，它并未明确“大撒哈拉伊斯兰国”的地位。<sup>③</sup>随着形势的变化，贝尔莫克塔尔领导的“穆拉比通组织”于 2015 年底又重新

---

<sup>①</sup> Jason Warner, “Sub-Saharan Africa’s Tree ‘New’ Islamic State Affiliates,” *CTC Sentinel*, Vol. 10, No. 1, 2017, p. 30.

<sup>②</sup> AFP, “Sahel: Un Chef d’Al-Mourabitoune Prête All égeance à l’organisation De l’État Islamique,” *Agence France Presse*, May 15, 2015, <http://www.france24.com/fr/20150514-sahel-groupe-jihadiste-prete-allegance-organisation-etat-islamique-belmokhtar-sahraoui-mourabitoune>.

<sup>③</sup> Jason Warner, “Sub-Saharan Africa’s Tree ‘New’ Islamic State Affiliates,” *CTC Sentinel*, Vol. 10, No. 1, 2017, p. 29.

加入“伊斯兰马格里布基地组织”。<sup>①</sup>

“索马里伊斯兰国”则是由亲“基地”组织的“青年党”骨干阿卜杜勒·穆明（Abdulqadir Mumin）自立山头建立的极端组织。穆明自2010年返回索马里之后，迅速成为索马里“青年党”的主干。随着2015年“伊斯兰国”对索马里“青年党”进行利诱，穆明因试图效忠“伊斯兰国”遭到“青年党”的打压，并促使其逃至邦特兰地区组建“索马里伊斯兰国”，该组织的人数也迅速从最初的20人扩大至200多人。<sup>②</sup>但是，“伊斯兰国”并未接受“索马里伊斯兰国”的效忠。“索马里、肯尼亚、坦桑尼亚和乌干达伊斯兰国”的领导人穆罕默德·阿卜迪·阿里（Mohamed Abdi Ali），其大多数成员来自东非各国。该组织也是从索马里“青年党”分离出来的组织，其原因在于它对“青年党”拒绝效忠“伊斯兰国”强烈不满。<sup>③</sup>2016年9月，该组织宣布向“伊斯兰国”效忠。<sup>④</sup>

第三，“伊斯兰国”对撒哈拉以南非洲地区极端组织的活动方式产生了重要影响。

在追求“建国”方面，“伊斯兰国”自成立之日起就把建立一个“哈里发国家”作为其始终如一的努力目标，并立即将其付诸实践。“博科圣地”同样试图在尼日利亚建立一个伊斯兰神权国家，但一直未能建立准国家化的统治体系。从“博科圣地”的活动范围来看，早期的“博科圣地”成员主要实行游击战术，居无定所。随着“伊斯兰国”于2014年6月宣布建立哈里发国家，“博科圣地”也紧随“伊斯兰国”的“建国”脚步，于同年8月宣布建立自己的伊斯兰哈里发国家，进入实体化、准国家化的自治阶段。<sup>⑤</sup>

在暴力极端主义的意识形态方面，“伊斯兰国”顽固坚持所谓“定叛”原则，它不仅把阿拉伯国家的世俗统治者视为“叛教者”和“圣战”打击的

---

<sup>①</sup> Daveed Gartenstein-Ross, Nathaniel Barr, and Bridget Moreng, *The Islamic State's Global Propaganda Strategy*, p. 76.

<sup>②</sup> Jason Warner, "Sub-Saharan Africa's Tree 'New' Islamic State Affiliates," *CTC Sentinel*, p. 30.

<sup>③</sup> Jason Warner, "Sub-Saharan Africa's Tree 'New' Islamic State Affiliates," *CTC Sentinel*, p. 31.

<sup>④</sup> Ibid.

<sup>⑤</sup> Yahaya Abubakar, "Boko Haram and Islamic State of Iraq and Syria: The Nexus," *Polac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Humanities and Security Studies*, Vol. 2, No. 1, 2016, pp. 299-312.

首要目标，还把反对其主张的普通穆斯林视为“叛教者”，坚持对“叛教者”进行残忍杀戮，并允许残杀妇女和儿童。<sup>①</sup>受“伊斯兰国”暴力极端主义意识形态的影响，“博科圣地”也强调“定叛”原则，试图消灭“叛教者”和“异教徒”，以“净化”伊斯兰社会，<sup>②</sup>并在尼日利亚煽动穆斯林之间的教派冲突，袭击少数派的什叶派伊斯兰教徒。<sup>③</sup>

在军事实力和动员能力方面，撒哈拉以南非洲地区的极端组织都远远逊色于“伊斯兰国”，且并不具备发动常规战争的能力。为了增强对所占领区域的控制能力并对周边区域产生威慑效应，非洲的极端组织纷纷效仿“伊斯兰国”的宣传方式和活动方式。例如，在“伊斯兰国”的影响下，“博科圣地”于2015年1月初创建了第一个“推特”账号，而此前其宣传方式十分落后。<sup>④</sup>随着“推特”账号的建立，该组织的宣传能力得到提升，宣传途径更加多元。此外，“博科圣地”还效仿“伊斯兰国”在其发布的视频中提供多种语言的字幕，并使用更加精致的制图法。2015年3月，“博科圣地”发布了一段对两名尼日利亚人进行斩首的视频，这种残忍手法与“伊斯兰国”十分相似。<sup>⑤</sup>不难看出，撒哈拉以南非洲地区极端组织的宣传方式深受“伊斯兰国”的影响，并有趋同的趋势。

## 二、“伊斯兰国”在撒哈拉以南非洲地区扩张的有利因素

“伊斯兰国”在撒哈拉以南非洲地区扩张面临的有利因素是多方面的。伊斯兰极端主义的盛行，是有利于“伊斯兰国”在当地渗透的重要土壤；当地部分国家治理能力低下乃至治理缺失，为“伊斯兰国”势力的蔓延提供了空间；经济凋敝、民生艰难、社会矛盾激化为“伊斯兰国”势力的繁衍提供

---

<sup>①</sup> 刘中民、俞海杰：《“伊斯兰国”的极端主义意识形态探析》，第55页。

<sup>②</sup> Anthony N. Celso, “The Islamic State and Boko Haram: Fifth Wave Jihadist Terror Groups,” *Orbis*, Vol. 59, No. 2, 2015, p. 267.

<sup>③</sup> J. Peter Pham, “Boko Haram: The Strategic Evolution of the Islamic State’s West Africa Province,” *The Journal of the Middle East and Africa*, Vol. 7, No. 1, 2016, p. 13.

<sup>④</sup> Daveed Gartenstein-Ross, Nathaniel Barr, and Bridget Moreng, *The Islamic State’s Global Propaganda Strategy*, p. 67.

<sup>⑤</sup> *Ibid.*

了条件；部分国家的边境管控松懈也为“伊斯兰国”的渗透提供了便利。

第一，伊斯兰极端主义的盛行为“伊斯兰国”在撒哈拉以南非洲地区的渗透提供了土壤。

在历史上，伊斯兰教大多是以和平的方式通过撒哈拉、印度洋商道传播至撒哈拉以南非洲地区，后与非洲南部文明相结合，形成了较为温和、包容的伊斯兰文化。随着西方殖民主义者的入侵，撒哈拉以南非洲地区的伊斯兰教日渐式微。为探索复兴伊斯兰世界的路径，19世纪末20世纪初哲马鲁丁·阿富汗尼（Jamal al-Din al-Afghani）、穆罕默德·阿布杜（Muhammad Abduh）所领导的“萨拉菲派”（Salafiyyah）在埃及掀起了一场声势浩大的“萨拉菲运动”，该运动被视为非洲萨拉菲主义产生的标志。<sup>①</sup>埃及作为萨拉菲主义思潮最兴盛的地区，通过其发达、完备的伊斯兰教育系统成功吸引到来自撒哈拉以南非洲地区的广大穆斯林，这些穆斯林学成归国后，便在撒哈拉以南非洲地区形成了一个独立的萨拉菲主义传播中心，并影响到各自所在的国家乃至周边地区。<sup>②</sup>

20世纪50年代，在石油美元的刺激和支撑下，沙特阿拉伯开始通过援建宗教学校、资助清真寺和促进教育交流等方式在撒哈拉以南非洲地区进行宗教渗透，使保守的瓦哈比主义（Wahhabism）传播至广阔的撒哈拉以南非洲地区。<sup>③</sup>在此过程中，萨拉菲主义（Salafism）在撒哈拉以南非洲地区进行了新一轮大规模的传播。虽然主流的瓦哈比教派主要采取和平的方式传教，但其极端派别也不乏暴力极端活动，甚至与宗教极端组织和恐怖组织有或明或暗的合作。<sup>④</sup>此外，由于沙特阿拉伯向撒哈拉以南非洲地区提供的援助有许多被私人基金会操作，导致大量资金落入极端组织之手，并服务于撒

---

<sup>①</sup> Shaykh Muhammad Hisham Kabbani, *The “Salafi Movement” Unveiled*, Washington D. C.: As-Sunnah Foundation of America, 1997, p. 5.

<sup>②</sup> Yunus Dumbé, “The Salafi Praxis of Constructing Religious Identity in Africa: A Comparative Perspective of the Growth of the Movements in Accra and Cape Town,” *Islamic Africa*, Vol. 2, No. 2, 2011, pp. 100-104.

<sup>③</sup> David Mc Cormack, *An African Vortex: Islamism in Sub-Saharan Africa*, Washington, D.C.: The Center for Security Policy, 2005, p. 5.

<sup>④</sup> 李维建：《撒哈拉以南非洲伊斯兰极端主义》，《世界宗教文化》2013年第3期，第48页。

哈拉以南非洲地区极端组织与全球极端组织的联系。<sup>①</sup>

20世纪90年代后,撒哈拉以南非洲地区的萨拉菲主义开始呈现极端化趋势。一方面,随着撒哈拉以南非洲地区的部分国家陷入“民主化陷阱”,这些国家出现了中央政府弱化、贫富差距巨大、经济发展不平衡等问题,具有极端性质的反政府武装萨拉菲主义组织开始涌现,如“伊斯兰马格里布基地组织”、“博科圣地”和索马里“青年党”等。另一方面,随着阿富汗抗苏战争的结束,参与战斗的撒哈拉以南非洲地区的圣战者回国后,不仅更加坚定了萨拉菲主义信念,而且试图将“基地”组织发展出的极端化萨拉菲主义组织模式引入撒哈拉以南非洲地区。<sup>②</sup>当前,受瓦哈比主义主张建立伊斯兰政权和伊斯兰国家等理念的影响,大约30%以上的撒哈拉以南非洲地区的穆斯林希望在有生之年见证“哈里发国家”的重建,重回伊斯兰统治的黄金时期。<sup>③</sup>因此,瓦哈比主义在撒哈拉以南非洲地区落地生根及其导致的宗教保守化,为“基地”组织和“伊斯兰国”等极端组织向该地区渗透提供了宗教土壤。

第二,撒哈拉以南非洲地区的部分国家治理能力低下乃至治理缺失,为“伊斯兰国”在该地区蔓延提供了空间。

撒哈拉以南非洲地区的许多国家长期处于动荡状态,政府治理能力孱弱或缺位,为“伊斯兰国”的渗透提供了可乘之机。非洲民族国家体系的形成是西方殖民主义人为分割的产物,严重违背非洲的民族、宗教等人文地理特点,导致非洲的边界争端和跨界族群问题异常复杂,以致非洲的边界冲突连绵不断,国内的族群和宗教冲突层出不穷。据统计,1960年至1999年间全球共爆发78场战争,其中40场发生在非洲,占总数的51.28%。<sup>④</sup>其中大部分战争都是非洲国家内部的族群和地方势力要求自治或独立所致,并严重威胁非洲国家的稳定。

---

<sup>①</sup> David Mc Cormack, *An African Vortex: Islamism in Sub-Saharan Africa*, p. 8.

<sup>②</sup> 王涛、曹峰毓:《伊斯兰马格里布基地组织产生的背景、特点及影响》,《西亚非洲》2016年第3期,第83页。

<sup>③</sup> Pew Forum, *Tolerance and Tension: Islam and Christianity in Sub-Sahara Africa*, Washington, D.C.: Pew Research Center, 2010, p. 2.

<sup>④</sup> John C. Anyanwu, *Economic and Political Causes of Civil Wars in Africa: Some Econometric Results*, Abidjan: The African Development Bank, 2002, p. 8.

冷战结束后，在“民主化”浪潮的冲击下，撒哈拉以南非洲地区许多国家内部的族群、宗教、地方势力之间的矛盾不断加剧，导致非洲多国陷入内战或种族仇杀，部分国家陷入严重的无政府状态。从整体来看，在冷战结束初期，撒哈拉以南非洲地区的冲突和战争呈现井喷式增长，并于 1993 年达到顶峰，在这一年间该地区近 2/5 的国家处于战乱状态；整个 20 世纪 90 年代期间，撒哈拉以南非洲地区所谓“失败国家”的数量增加了近一倍。<sup>①</sup> 在东非地区，索马里的西亚德·巴雷（Mohamed Siad Barre）政权于 1991 年 1 月被推翻后，该国就陷入了长期的军阀割据和无政府状态。索马里政府的长期缺位为极端势力的滋生和扩张提供了土壤。<sup>②</sup> 其中，主张在非洲之角建立所谓“大索马里”的泛索马里主义，不仅深刻影响了索马里的政治发展，而且严重威胁周边国家的国家主权和政治稳定。在西非和中非地区，马里、乍得、刚果民主共和国和中非共和国等国家政权长期脆弱、治理能力低下，致使地方势力和部落势力借机不断扩大影响，使其成为恐怖主义势力盘踞的重点区域。<sup>③</sup>

进入 21 世纪以来，虽然撒哈拉以南非洲地区大规模冲突爆发的频率有所降低，但是由族群冲突导致的暴力冲突和国家内战有增无减，并使部分国家陷入“权力真空”。例如，在 2010 年，撒哈拉以南非洲地区暴力冲突爆发的频率达到了 20 世纪 90 年代中期水平的四倍，政局动荡和恐怖威胁逐渐取代内战成为该地区部分国家陷入严重动乱的主要原因。<sup>④</sup> 根据“武装冲突地点和事件数据项目”（Armed Conflict Location & Event Data Project）的统计，2014 年成为非洲自 1999 年以来最为动荡的一年。<sup>⑤</sup> 在这一背景之下，撒哈拉以南非洲地区的部分国家政权长期缺位，无疑为“伊斯兰国”进行组织扩张和意识形态的渗透提供了广阔空间，这也是极端组织在非洲东部和西

---

<sup>①</sup> Monty G. Marshall, *Conflict Trends in Africa, 1946-2004: A Macro-Comparative Perspective*, London: Crown copyright, 2006, p. 3.

<sup>②</sup> 王涛、秦名连：《索马里青年党的发展及影响》，《西亚非洲》2013 年第 4 期，第 74 页。

<sup>③</sup> CRS, *Terrorism and Violent Extremism in Africa*, Washington, D.C.: Congressional Research Service, 2016, p. 6.

<sup>④</sup> Kathleen Beegle, Luc Christiaensen, and Andrew Dabalen, *Isis Gaddis, Poverty in a Rising Africa: Overview*, Washington, D.C.: The World Bank, 2016, p. 12.

<sup>⑤</sup> CRS, *Terrorism and Violent Extremism in Africa*, p. 4.

部地区活动猖獗的原因所在。

第三，经济凋敝、民生艰难、社会矛盾激化为“伊斯兰国”在撒哈拉以南非洲地区的繁衍提供了条件。

撒哈拉以南非洲地区的许多国家独立后，经济发展落后、腐败盛行、贫富悬殊、社会动荡、政变频发、失业率居高不下，年轻人不满情绪严重等问题一直存在。<sup>①</sup>在西亚北非地区“阿拉伯之春”的影响下，撒哈拉以南非洲地区国家的社会矛盾进一步加剧，并为“伊斯兰国”等极端组织的渗透提供了社会土壤。非洲地区的实际国内生产总值增长率已由2012年的6.2%下降到了2016年的2.2%，而通货膨胀率则从2013年的6.7%增加至2016年的10.1%。<sup>②</sup>非洲国家的失业率更是居高不下。2015年非洲的失业率为12.1%，而北非地区成为全球青年失业率最高的地区，高达30%；<sup>③</sup>2016年，撒哈拉以南非洲地区的失业率为7.2%，高于世界平均水平的5.7%，失业人数高达2800万人。<sup>④</sup>

此外，虽然近年来非洲的贫困状况有所改善，但贫困率仍然很高。近年来，由于受到极端干旱气候的影响，撒哈拉以南非洲地区的贫困化进一步加剧。根据世界银行2015年公布的数据，撒哈拉以南非洲地区日均生活费用不足1.9美元的贫困人口比例已从1990年的56.8%下降至2012年的42.7%，但仍远远高于世界平均水平的12.7%。<sup>⑤</sup>大量失业和贫困人口尤其是失业青年的存在，无疑为“伊斯兰国”等极端组织招募人员提供了储备，而对社会现状严重不满的失业青年也极易受到蛊惑，或者从谋生的角度出发选择加入极端组织。在非洲之角，许多青年选择加入极端组织和恐怖组织，其重要原因之一在于能得到极端组织提供的每月150—500美元的津贴。<sup>⑥</sup>

---

<sup>①</sup> Virginia Comolli, *Boko Haram: Nigeria's Islamist Insurgency*, London: Hurst & Company, 2015, p. 42.

<sup>②</sup> ECA, *African Statistical Yearbook 2017*, Addis Ababa: African Centre for Statistics, 2017, p. 49.

<sup>③</sup> ILO, *World Employment and Social Outlook: Trends 2016*, Geneva: International Labour Office, 2016, p. 30.

<sup>④</sup> ILO, *World Employment and Social Outlook: Trends 2017*, pp. 6-16.

<sup>⑤</sup> Francisco H. G. Ferreira et al., *A Global Count of the Extreme Poor in 2012*, Washington, D.C.: The World Bank, 2015, p. 53.

<sup>⑥</sup> Anneli Bothaand Mahdi Abdile, *Radicalisation and Al-Shabaab Recruitment in Somalia*, Institute for Security Studies, Pretoria: Institute for Security Studies, 2014, p. 8.

第四，撒哈拉以南非洲地区部分国家的边境管控松懈也为“伊斯兰国”的渗透提供了便利。

作为殖民主义的遗产，非洲国家的边界有 44%是按经线和纬线划分的，有 30%是用直线或曲线的几何方法切割的，只有 26%是由河流、湖泊和山脉所构成的自然边界线。<sup>①</sup> 这种西方强加的边界划分不仅成为非洲国家之间长期冲突的诱因所在，而且由于跨界民族的普遍存在致使边境管控十分困难，并常常因某些国家的战乱导致边境管理失控，这些都为“伊斯兰国”等极端组织和武装叛乱分子的跨境活动以及军火走私等提供了方便。

据统计，非洲地区共有多达 109 条国家边境线，总长度约为 4.5 万公里，其中仅有 35%的边界被明确划定。目前，非洲大约有 350 个官方过境点，平均每 120 公里边界线有一个过境点，且大多数过境点都距离实际边境 16 至 20 公里，更为严重的是非洲国家间有 414 条跨越国境的道路，其中的 69 条全程都没有设立边境检查站。<sup>②</sup> 因此，极端分子不仅可以轻易从外部渗入非洲，而且能够在非洲国家间自由流动。例如，在非洲之角地区，索马里长期处于无政府状态，边界监管处于瘫痪状态。据美国司法部消息称，75%以上来自也门、巴基斯坦、伊朗等地的“基地”组织活跃分子，最终逃到了索马里，<sup>③</sup> 这无疑与索马里形同虚设的边界有关。此外，“伊斯兰国”在利比亚的渗透及影响已经跨越国界，蔓延至尼日尔、马里、尼日利亚等周边国家。在此背景之下，“伊斯兰国”在萨赫勒地区和马格里布地区的活动日益活跃。

不难发现，随着一些极端组织派系宣布向“伊斯兰国”效忠，“伊斯兰国”在非洲的渗透和蔓延已经能够轻而易举地突破传统意义上的国家边界限制，并对更加广阔的撒哈拉以南非洲地区的安全稳定造成严重冲击。<sup>④</sup> 因此，非洲各国之间边界管控的薄弱或缺失，也为极端分子从北非流窜至撒哈拉以

---

<sup>①</sup> 马嫒：《区域主义和发展中国家》，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2 年版，第 107 页。

<sup>②</sup> AU, *Draft African Unions Strategy for Enhancing Border Management in Africa*, Addis Ababa: African Union, 2012, p. 17.

<sup>③</sup> 刘中民、任华：《也门极端组织的演变、成因及其影响》，《阿拉伯世界研究》2017 年第 2 期，第 12 页。

<sup>④</sup> Abdelhak Bassou and Ihssane Guennoun, *Al Qaeda Vs. Daech in the Sahel: What to Expect?* Rabat: OCP Policy Center, 2017, p. 2.



南非洲地区提供了极大便利。

为了促进经贸投资，吸引技术人才，非洲联盟（African Union）正在探寻更为自由的签证政策。可以预见，这一政策在有利于人才流动的同时，也将使非洲国家边境管控的难度进一步加大，并加大极端分子利用该政策潜入非洲的风险。<sup>①</sup> 此外，非洲跨境地区长期存在大量非法贩运毒品、武器、人口和其他非法贸易行为，使极端分子能够轻易获得物资和武器，增强了其生存能力和活动能力。<sup>②</sup> 而极端组织自身也经常利用边境管控薄弱的状况进行非法走私活动以获取资金。

### 三、“伊斯兰国”在撒哈拉以南非洲地区扩张的制约因素

“伊斯兰国”在撒哈拉以南非洲地区的渗透和扩张对非洲的安全形势和反恐局势构成了严峻挑战。但就目前情况来看，“伊斯兰国”尚未在撒哈拉以南非洲地区扎根，其影响力还相对有限。随着“伊斯兰国”在伊拉克、叙利亚等地走向穷途末路，致使其在非洲的扩张也将失去组织领导和资金等方面的支持，进而影响其在撒哈拉以南非洲地区的“本土化”发展。

第一，非洲本土极端组织各有诉求，对“伊斯兰国”的依赖相对有限。

一方面，“伊斯兰国”在撒哈拉以南非洲地区拓展势力范围时，试图以超民族、超地域的集权式哈里发国家来实现对该地区的掌控，这与非洲本土极端组织的“建国”要求不符。以“博科圣地”和索马里“青年党”为例，“博科圣地”自 2002 年成立以来，其目标是在尼日利亚东北部建立一个纯粹的“伊斯兰国家”。而索马里“青年党”作为一支信奉“圣战萨拉菲主义”（Jihadist Salafism）的伊斯兰极端主义反政府武装，其目标是推翻索马里联邦过渡政府（Somalia's Transitional Federal Government），建立一个囊括全部索马里人在内的“大索马里国家”。<sup>③</sup> 这些组织的“建国”要求都与“伊

---

<sup>①</sup> Kieron Monks, “United States of Africa? African Union Launches all-Africa Passport,” CNN, July 19, 2016, <http://edition.cnn.com/2016/07/05/africa/african-union-passport/index.html>.

<sup>②</sup> IEP, *Global Terrorism Index 2016*, Sydney: The Institute for Economics and Peace, 2016, p. 84.

<sup>③</sup> 王涛、秦名连：《索马里青年党的发展及影响》，第 71 页。

斯兰国”试图建立一个由“哈里发国家”集中控制的全球性帝国的野心相冲突。“伊斯兰国”在对非洲本土极端组织进行渗透的过程中，完全低估了这些组织的“建国”要求，进而难以获得这些组织的实质性支持。

另一方面，非洲本土极端组织的建立大多早于“伊斯兰国”，已经形成较为完备的组织体系，并不严重依赖于“伊斯兰国”的支持和帮扶。以索马里“青年党”为例，其资金、武器、人员来源渠道已自成体系。“青年党”的资金来源渠道多种多样，不仅有来自于“基地”组织的资助，还有一些国家政府为其提供资金支持，网络筹款亦是其资金的重要来源。海湾国家一直以来都在为“青年党”暗中提供资金支持，其中有资料认为支持力度最大的便是被视为全球萨拉菲圣战者“金库”的沙特阿拉伯，<sup>①</sup>当然这些资金多来源于民间，其渠道比较隐蔽，追踪和监控也比较困难。此外，厄立特里亚政府为了遏制埃塞俄比亚在非洲之角地区不断扩大的影响力，也曾一度通过驻肯尼亚大使馆向“青年党”每月提供约一万美元的资金。<sup>②</sup>虽然“伊斯兰国”帮助“青年党”制作更高质量的宣传视频，并为索马里南部的极端分子提供了一些财政支持，但几乎没有证据表明“伊斯兰国”为撒哈拉以南非洲地区的任何支持者提供武器或派遣部队。<sup>③</sup>因此，“伊斯兰国”对撒哈拉以南非洲地区的主要极端组织的影响力仍然十分有限。

第二，“基地”组织在撒哈拉以南非洲地区影响深厚，“伊斯兰国”尚难以撼动其领导地位。

“伊斯兰国”不断加强向撒哈拉以南非洲地区的渗透，不可避免地分散了原先效忠于“基地”组织的非洲极端主义势力，并对“基地”组织在该地区的传统权威形成了挑战。但是，相对而言，“基地”组织在撒哈拉以南非洲地区的存在根深蒂固，其基础远超“伊斯兰国”。早在“伊斯兰国”建立之前，“基地”组织就在撒哈拉以南非洲地区建立了势力范围。20世纪90年代，随着阿富汗战争的结束，一批曾经在阿富汗参战的“圣战者”返回非

---

<sup>①</sup> James M. Dorsey, “Saudi Arabia Embraces Salafism: Counting the Arab Uprising?” S. Rajaratnam School of International Studies, January 11, 2012, pp. 2-3.

<sup>②</sup> 王涛、秦名连：《索马里青年党的发展及影响》，第76页。

<sup>③</sup> Jarle Hansen, “The Islamic State Is Losing in Africa,” *Foreign Policy*, December 13, 2016, <http://foreignpolicy.com/2016/12/13/the-islamic-state-is-losing-in-africa/>.

洲，他们试图根据“基地”组织的思想，建立取代世俗政权的“纯正的伊斯兰”政府。<sup>①</sup> 1998年“基地”组织对美国驻肯尼亚和坦桑尼亚大使馆进行炸弹袭击以及随后的一系列袭击事件，都显示了该组织在撒哈拉以南非洲地区已拥有强大的影响力。2006年，以阿尔及利亚为大本营的“萨拉菲宣教与战斗组织”（Salafist Group for Call and Combat）宣布加入“基地”组织，并更名为“伊斯兰马格里布基地组织”，此后在摩洛哥、阿尔及利亚、马里、尼日尔、毛里塔尼亚等国家制造了多起恐怖事件。<sup>②</sup> 在东非地区，“基地”组织在苏丹建立了训练营地，试图与索马里的武装分子建立联系，并将其影响力扩展到了埃塞俄比亚、肯尼亚乃至整个“大湖地区”（Great Lakes Region）。<sup>③</sup> 以穆斯林居多的西非国家，特别是非洲人口大国尼日利亚，也不同程度受到“基地”组织的影响，<sup>④</sup> “博科圣地”组织的建立更是深受“基地”组织的影响。

在萨赫勒地区虽然有“伊斯兰马格里布基地组织”的分支机构“穆拉比通组织”宣布效忠“伊斯兰国”，但是“伊斯兰马格里布基地组织”一直对此矢口否认。<sup>⑤</sup> 在西非地区，“博科圣地”在表示支持“伊斯兰国”的同时并没有完全放弃其同“基地”组织的隶属关系。<sup>⑥</sup> 在非洲之角地区，虽然“伊斯兰国”一直将大量资金投向索马里，但是索马里“青年党”高层官员一直对“伊斯兰国”要求其效忠表示拒绝。<sup>⑦</sup> 由此可见，虽然“伊斯兰国”在全球其他地区与“基地”组织的竞争中逐渐占据上风，但在撒哈拉以南非洲地区的影响力还很难与“基地”组织相抗衡。

第三，全球反恐合作的加强，制约了“伊斯兰国”在撒哈拉以南非洲地区的扩张。

---

<sup>①</sup> Jakkie Cilliers, *Violent Islamist Extremism and Terror in Africa*, Pretoria: Institute for Security Studies, 2015, p. 24.

<sup>②</sup> 刘中民：《恐怖主义肆虐非洲“不稳定之弧”》，《世界知识》2013年第22期，第46页。

<sup>③</sup> Angel Rabasa, *Radical Islam in East Africa*, Santa Monica: RAND Corporation, 2009, p.2.

<sup>④</sup> 于毅：《警惕“基地”组织在非洲滋生》，《光明日报》2011年5月17日，第8版。

<sup>⑤</sup> The International Institute for Strategic Studies, “ISIS Gains Ground in Sub-Saharan Africa,” *Strategic Comments*, Vol. 21, 2015, pp. 9-10.

<sup>⑥</sup> Simon Allison, *The Islamic State: Why Africa Should be Worried*, p. 6.

<sup>⑦</sup> Daveed Gartenstein-Ross, Nathaniel Barr, and Bridget Moreng, *The Islamic State's Global Propaganda Strategy*, p. 76.

一方面，“伊斯兰国”在中东的准国家实体已基本被国际反恐力量消灭，致使其在撒哈拉以南非洲地区的影响力也严重受损。“伊斯兰国”向全球扩张的前景取决于该组织在叙利亚和伊拉克主要战场攻城略地并加以控制的能力。<sup>①</sup>为了能够在撒哈拉以南非洲地区招募到更多“圣战者”，说服更多“基地”组织分支机构加入“伊斯兰国”，它必须展现出不断扩张的势头。但随着“伊斯兰国”在叙利亚和伊拉克的影响力和控制力丧失殆尽，其建立全球性“哈里发帝国”的乌托邦目标在撒哈拉以南非洲地区的吸引力也已大打折扣，这无疑将削弱其在撒哈拉以南非洲地区的号召力和影响力。<sup>②</sup>

另一方面，针对“伊斯兰国”在撒哈拉以南非洲地区扩张所造成的威胁，国际社会纷纷施以援手，加强撒哈拉以南非洲地区国家应对“伊斯兰国”侵袭的能力。2015年，在非盟支持下，由2.5万名士兵组成的非洲待命部队组建完毕，并已具备快速部署能力。<sup>③</sup>欧盟除向撒哈拉以南非洲地区各国应对极端组织的部队提供资金援助外，还为马里、尼日尔和索马里的部队和警察提供培训。<sup>④</sup>此外，包括英国、法国、美国、土耳其、摩洛哥和阿尔及利亚在内的国家纷纷支持撒哈拉以南非洲地区国家的反恐行动，如提供训练和设备等。2015年12月，英国向尼日利亚派遣了300名军事人员，以提升尼军队打击“博科圣地”的能力。<sup>⑤</sup>美国国际开发署（United States Agency for International Development）2017财年投入超过4300万美元的资金用于支持撒哈拉以南非洲地区打击暴力极端主义的行动，其中四分之一以上资金投向尼日利亚。<sup>⑥</sup>作为“西非跨撒哈拉反恐怖主义伙伴关系”（the Trans-Sahara Counter-Terrorism Partnership）和“东非反恐怖主义伙伴关系”（the Partnership for Regional East Africa Counterterrorism）的主导者，美国也积极承担起在撒哈拉以南非洲地区的反恐领导权。2017年11月3日，美国针对活动在索马

---

<sup>①</sup> Daveed Gartenstein-Ross, Nathaniel Barr, and Bridget Moreng, *The Islamic State's Global Propaganda Strategy*, p. 75.

<sup>②</sup> Joseph Siegle, "ISIS in Africa: Implications from Syria and Iraq," <http://africacenter.org/spotlight/islamic-state-isis-africa-implications-syria-iraq-boko-haram-aqim-shabaab/>.

<sup>③</sup> IISS, *Strategy Survey 2016, The Annual Review of World Affairs*, London: The International Institute of Strategic Studies, 2016, p. 137.

<sup>④</sup> CRS, *Terrorism and Violent Extremism in Africa*, p. 12.

<sup>⑤</sup> Ibid.

<sup>⑥</sup> Ibid., p. 17.

里的“伊斯兰国”武装分子进行了两次无人机打击，这是美国首次在非洲之角打击该组织的“圣战”分子，也标志着美国在撒哈拉以南非洲地区打击“伊斯兰国”行动的重大突破。<sup>①</sup> 为了限制“伊斯兰国”在撒哈拉以南非洲地区的扩散，该地区各国正在积极完善反恐机制，防止“伊斯兰国”的进一步渗透。它们积极通过完善反恐法律制度、建立跨境打击合作框架和切断恐怖主义资金来源等手段，加强对极端主义和恐怖主义的打击力度。2016年，乌干达、坦桑尼亚、塞内加尔、毛里塔尼亚、南非等国都纷纷确立和完善反恐法律制度，为打击恐怖主义提供有效的法律支撑和保障。<sup>②</sup> 以上措施无疑将大大压缩“伊斯兰国”在撒哈拉以南非洲地区扩张的空间。

## 结 束 语

通过对“伊斯兰国”在撒哈拉以南非洲地区的渗透和扩张进行分析，可以得出以下几点基本认识。

第一，在全球恐怖活动所带来的“示范效应”的影响之下，正如“博科圣地”对“伊斯兰国”建国理念、宣传方式的学习和效仿一样，某一具有影响力的恐怖组织的发展模式和理念极易成为众多恐怖势力模仿的典型，而这些恐怖势力能够轻易借势，不断搅动本就动荡不安的地区局势。因此，非洲国家在思想和精神层面开展去极端化的国际合作的同时，也应在网络和新媒体技术等领域对抗极端主义、恐怖主义的蛊惑和宣传。

第二，在全球反恐战争所带来的“挤压效应”的影响之下，像撒哈拉以南非洲地区这样的“反恐洼地”开始逐渐沦为国际恐怖活动的重灾区。从“伊斯兰国”在撒哈拉以南非洲地区渗透的原因来看，它并非单一的安全问题，其背后是撒哈拉以南非洲地区政治、经济及社会发展中存在的深层次问题，是撒哈拉以南非洲地区自身“顽疾”的综合体现。因此，撒哈拉以南非洲地

---

<sup>①</sup> Bill Roggio and Caleb Weiss, “US Targets Islamic State Fighters in Somali Airstrikes,” *The Long War Journal*, November 3, 2017, <https://www.longwarjournal.org/archives/2017/11/us-targets-islamic-state-loyal-fighters-in-somalia-with-airstrike.php>.

<sup>②</sup> United States Department of State, *Country Reports on Terrorism 2016*, Washington, D.C.: Bureau of Counterterrorism, 2017, pp. 15-63.

区的国家在不断加强国际合作，共同应对恐怖主义和极端主义威胁的同时，更应加强自身政治、经济、社会的整体进步和治理能力，从源头上根除恐怖活动得以迅速蔓延的诱因。

第三，“伊斯兰国”不断加强向撒哈拉以南非洲地区的蔓延，不可避免地分散了“基地”组织原先对非洲恐怖主义势力的垄断，对“基地”组织在撒哈拉以南非洲地区的传统权威形成了挑战。但是，相对而言，“基地”组织在撒哈拉以南非洲地区的根基更为深厚。其突出表现是，一些“基地”组织的分支机构在表示支持“伊斯兰国”组织的同时，并未放弃其同“基地”组织的隶属关系，表现出典型的机会主义色彩。未来，“伊斯兰国”和“基地”组织在非洲地区将围绕势力范围和领导权展开争夺，非洲有可能成为两大恐怖组织激烈竞争的主战场。

第四，虽然全球恐怖活动已经步入“后伊斯兰国”时代，但“伊斯兰国”所造成的国际和地区影响仍在持续。在撒哈拉以南非洲地区，“伊斯兰国”在该地区的渗透和扩张已经造成了本土恐怖组织的分化、重组，其中一些曾把自己标榜成为“伊斯兰国”一部分、试图获得更多资金和武器支持的原“基地”组织分支机构，有可能重新回到“基地”组织的怀抱，而其他新兴的极端势力也有可能重新融入到“基地”组织的网络之中。在此复杂背景下，如何在“反恐洼地”推动国际反恐合作将是一大难点。为此，美国等西方国家必须摒弃以往单边主义和利己主义的做法，继续承担起帮助边缘地区提升打击恐怖主义和极端势力能力的义务；新兴发展中国家也应积极提供必要的公共产品，推动平等互利的新型全球反恐机制的建立。实践证明，在面对日益多元且复杂的恐怖威胁时，任何国家都无法独善其身，唯有通力合作，才是未来国际反恐的可行出路。

[收稿日期：2017-11-21]

[修回日期：2017-12-26]

[责任编辑：陈鸿斌]